

书海一瓢

时代潮流中女性命运的观照

李心丽的小说集《流年》，其中15篇小说大都是围绕女性命运展开，她在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现当下女性婚姻生活悲喜愁苦的同时，也表现出对这纷繁变幻社会现实中女性生活的忧虑和困惑。

在读这本集子之前，我读过李心丽三篇小说，分别是《过客》《流年》和《迷藏》。多年习惯，我是看到好的小说都要随手发些议论，这三篇小说留给我的印象都不错，读过《过客》后曾写下一段话：“当今中国制造着一棵棵无根的沙蓬，他们不是在流浪，他们是在漂泊，是身的漂泊，是心的漂泊，是身心一起的漂泊。当安身立命的故园百孔千疮时，人的心也百孔千疮了。百孔千疮的心变得凉薄，不是没有家，而是有家不愿回，这就使这些漂泊的人无论到哪里都抱了一种过客的心态，‘那个遥远的地方，是一个属于他的世界，那儿，谁也不认识他。’但这样的地方显然是不会有的。”

我对《流年》是这样评价的：“小说写的是中年夫妻感情上的隔膜，这隔膜因要不要接房子要被拆迁的公婆同住的问题上产生，丈夫负气出走，最后因误会导致离婚。女性作者从女性主人公的角度展开叙述，写女性心理丝丝入扣。男女主人公的个性也在读完小说后给人深刻印象，妻子是个

强势和只着意小家庭生活的妻子，丈夫是个倔强而内心封闭的丈夫，他出走时和妻子什么也不说，甚至手机也扔在家里。他明明是因帮助别人而被拘，却负气说是嫖娼。其实他一直想对妻子说出原因，但性格因素决定了他不会在妻子面前低头，而当离婚一年，他终于对妻子说出原因后，妻子已经茫然了。陈若兰夫妇的悲剧固然是性格导致，然而，小说也折射出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冷漠所形成的彼此隔膜。小说开头陈若兰闺蜜丈夫的车祸去世是个很好的引子，这一细节与小说结尾，丈夫终于说出真实原因，而妻子“脸上的波澜有，但已经有些遥远了”前后呼应，更凸显出两个人的各自个性，使小说结构和谐完整。

《迷藏》写为报复出轨的丈夫，妻子主动出轨，并藏起和利用丈夫落在家中的手机，想从手机中所获信息找到丈夫的外遇。这是篇很有意味的小说，小说波澜不惊，于日常生活的平平叙述中却给出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结局：妻子布下的迷局没抓住丈夫的把柄，自己倒被抓了现行，暴露了自己出轨的对象不说，还以诈骗被抓进警局，而接她短信、告她诈骗、救她出警局的确是她的丈夫。和丈夫捉迷藏的结果是妻子没破了前一个迷局，倒给自己又布了

一个迷局。这个短篇的妙处在于，她明明写的是官员出轨，却让官员是否出轨成为妻子的迷局和留给读者的悬念。

一篇篇读过小说集中的小说后，我发现以上解读，纯属就事论事，我自己情绪的主观色彩太浓，重读这三篇小说后，恍然悟到李心丽在营构她的小说世界时，始终贯穿的是她对当今社会女性婚姻家庭生活的悲悯情怀与困惑之情。《过客》的主人公虽为男性，但造成他过客心态的却是在北京买不起房子，致使相处三年准备结婚的女友离他而去，而家中的老父亲又娶了带孩子的继母，所以他才决定40岁以前不结婚。那个离他而去的女友虽然着墨不多，却也有着除了房子之外的因素：他一周一次去发廊解决男人的问题，却对和他生活在一起、准备结婚的女友毫不隐瞒，让女友感到他很脏，这不能不说也是女友最终决定离开他的一个原因。

有的小说是写出来的，小说家们从生活中取材，他的所见所闻所历触动着他倾吐的欲望，他要将这些写下来让世人知道；有的小说是做出来的，小说家以观念取材，他认为他所是者，他极力渲染成小说，他认为他所不是者，他也写出来，一褒一贬，全在他自己的是非之中；有的小说是编出来的，小说家长于趋时，他的取材在于时人之喜恶，时势之需要，自己并无定见。三种作法并无高下，都可以出好小说，也都可以出劣小说。李心丽的写作显然属于第一种情况，她在一篇谈《迷藏》的文章中说，这篇小说的原型是她的一位朋友，那朋友在电话中向她“陈述了一些细枝末节……她是一个识大体的人，不会有那种无法掌控的爆发，只会一味隐忍，所以当她问我你说我怎么办的时候，一股悲凉的情绪从我的心中升起，她对我的信任让我对她充满了深深的怜惜和爱。我不知道她该怎么办，我说婚是不能离的，她说我知道，这个问题我们不用讨论就已经有了共识”。“生活中的故事是这样的，这个故事到此为止，后来好久没有联络，我试着给她打过一个电话，她和丈夫在新疆旅游，听声音过得还好，不知为什么我还是为她长吁了一口气。其实也不是为她，可能是为生活中这样比比皆是的际遇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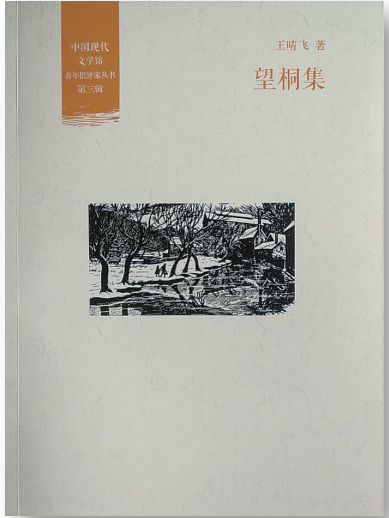
发的感叹。”作为一个身处中等城市中的女性作家，李心丽周围不乏这样的人，或在日常生活中，或在茶馆、饭桌上，她听着她们的讲述，关心着她们的喜怒哀乐，这些都成了她的小说素材。读李心丽的这类小说，可以读出女性作家的感性经验优势。在这篇文章中她还说：“有一个作家说，小说所要写的不是已有的发生，小说所要写的也不是放在客厅里让大家都能看到的東西，不是客厅写作，而是书房写作，卧室写作，卫生间写作，厨房写作。小说所要写的是非常个人化的与平常客厅里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卧室的一隅，厨房的一隅，或者卫生间的一隅”。她注重细节，她的小说细节使她的小说形成了独特的小说氛围。

李心丽是个颇具实力的小说作家。她的小说叙写着日常生活中婚姻和家庭种种琐屑细微背后潜藏的人性冲突。小说里的人是普通人，事是平常事，她以她女性特有的敏锐感觉从这些普通人、平常事中选取她小说中有意味的素材，以她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精准而生动地营造出一幕幕抓人人心的悲喜剧，让人读不忍释，非要看到结局。而结局却往往出人意料，这使她的小说具有了很强的可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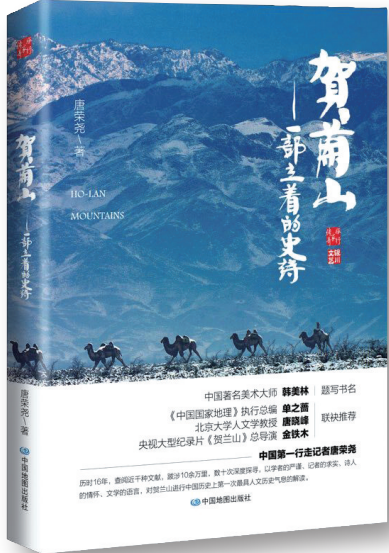
我很赞赏心丽的好朋友，同是女性作家的小岸对心丽小说的评价：“她的小说，其实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人，我们‘闯世界’与‘过生活’的艰涩与苍凉，我们‘寻理想’与‘奔出路’的苦闷与焦虑。那种试图摆脱平庸日子的不甘心，那种破茧般的痛苦挣扎，却又不得不屈服的无奈妥协。这也是整个时代的观照，人人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她捕捉到了，通过小说，艺术地表达出来了”。“心丽小说不仅仅是诗意的，还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挥之不去的荒诞感。她的小说没有跌宕的情节，却时有荒诞出没，显示了作家对小说的敏锐把握。她小说中的荒诞感，显示的是人性的复杂、错位与苍凉。同时也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美被放逐，无家可归。她的这些小说更像是献给这个时代的一曲挽歌，是一个诗人手持放大镜在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理切片。然而，这也正是小说存在的意义”。

□彭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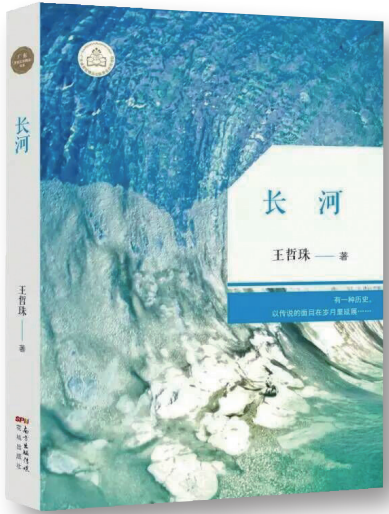
桃李天下



王晴飞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高研班学员，其论文集《望桐集》纳入“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现代文学与教育、学术制度部分。作为中国新文学发生与发展的现场，中国现代大学、学术制度与文学关系重大，本部分可视为中国新文学的外部研究。二是以鲁迅、胡适研究为中心，通过对作品及文学现场、学术制度的考察，梳理鲁、胡在左翼、自由主义标签下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三是当代作家作品论部分。结合文本细读与文史互证方法，分析当代作家作品，涉及孙犁、陈映真、尉天骢、贾平凹、刘亮程、葛亮等作家，既有文学史的视野，又尽量顾及文学评论的敏感鲜活。



唐荣尧为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二届高研班学员，其非虚构作品《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近日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者在研读了近千册文献，跋涉10余万里，对贺兰山进行了16年不间断科学考察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以文学的语言、参照纪录片拍摄的叙事手法，从贺兰山的历史、地理、宗教、人文等各个视角来展现了这座山的文化。



王哲珠为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二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小说《长河》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长河》书写的是一个村寨和一条河流的命运，也是心灵的命运；是一本族谱延续的伤痛，也是灵魂在饥饿感般的空虚与膨胀过度的欲望中、在背叛与坚守中的伤痛。作为一部乡土题材的作品，无论是作品对题材的驾驭，还是在写作技巧和叙事方式上的尝试，无不体现了作者创作乡土题材作品的雄心和努力。



我思我写

有光的地方

2012年完成了死循环长篇悬疑《轮回》之后，我不想再写类似死循环模式的悬疑了，至少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于是我开始慢慢摸索，就像在一条漆黑的巷子里努力地寻找有光的地方。后来我终于看到了一丝光亮，某一天我发现自己对人的心理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的转变或许是历经岁月、思想沉淀之后的必然产物，也许只是自己一时兴起而已。但无论如何，这种兴趣直接导致了我将自己在瑞士留学期间经历的一件轰动全球的谋杀案耗时两年打造成了一部心理悬疑长篇小说《死亡数字》。

《死亡数字》在楔子中所描述的情况是完全属实的，当时我是一名在瑞士留学实习的学生，凶杀案当晚我和几名工友一同前去酒吧消遣，其间离奇的遭遇使得我们

很幸运地与死神擦肩而过，但同时也阴差阳错地被警察抓捕而关押了起来。在被关押的14天里，每一天载戟子立、形影相吊的感觉历历在目，不能洗澡、不能通讯，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任何娱乐活动。那时候，自由第一次成了我生命中的奢侈品，我每一天都在祈祷能快点被释放出去，哪怕出去以后天天都睡在大街上，风餐露宿，我也愿意。

小说里讲述的是14个人，他们身上分别拥有忠诚、自信、善良、勇敢等优点，这些人之间原本毫无关系，但却接连被无情地杀害，杀人手法的残暴程度也令人瞠目结舌。为此，警方与凶手之间展开了一场殊死较量。

我一直在思考有关动物园里猛兽伤人的惨剧，虽然那些猛兽天性凶猛，但是不是

也由于长期被人类所禁锢、所奴役之后而产生了一种怨，从而实施了报复？动物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既然猛兽可以，那人为什么不可以？这不仅让我联想到了《斯坦福监狱实验》，该实验是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实验是把征募来的24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扮作狱警，一组扮作犯人。本来这个实验计划是14天，但到了第7天就宣告终止，终止的原因是该实验对扮演囚犯的实验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通过这种考量，我可能明白了为何会继《轮回》之后，我会经历长时间的摸索，再到后来决定写这部作品了。

如果说《轮回》是一部更加注重于炫技的悬疑作品，那么我个人认为《死亡数字》

则是一部能够引人深思的悬疑作品。如果说《轮回》是一个做工精致、巧夺天工木偶，那么我个人认为《死亡数字》则是那个能走能跳的匹诺曹。一部作品需要有精髓，就像一个人需要有灵魂，一本书如果带给你的仅是将一页纸匆匆翻完、读完，那最后留下的记忆就只剩下这本书里的故事和这本书自身的厚重了。而如果通过一部作品，能够带给读者一些人文历史、民族艺术的知识共享，或是引起一些社会问题、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共鸣，那才是远远超越书稿本身厚重的分量，这也是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应有的责任和使命吧，我想。

也许我真的在那条漆黑的巷子里寻找到了有光的地方。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二届高研班学员)

□徐亦砢

东庄西苑

一个南方孩子的笔记

10多天后，我从一个南方的孩子变成了北方的孩子。一个没有姐姐的人，到哪都有姐姐们的疼爱。比如，甘肃的黄璨姐给了我一罐蜂蜜，40多天了也没舍得喝，我要让不浅下去的甜满满温暖着。妈妈老担心我不会洗衣服，我和她开玩笑，找个姐姐帮我洗。她“嗯”了声。

收拾行李时，还犹豫着究竟来不来这个地方，好长一阵子了，“羔羊跪乳”的画面装满了我的脑袋，妈妈的腿伤没好，我得给她做饭煲汤。以前，“父母在，不远游”背得像句格言，此刻，6个字深深扎进了我的心窝。妈妈以中国母亲古老的口吻劝慰孩子安心出门，那句“别担心”比常州到北京的距离还长。8岁的孩子问我，“爸爸，你去北京干什么？”我说，“爸爸和秒秒一样，只有8岁了，去那读书。”

那天，北京的天空蔚蓝。我心情愉悦，在书桌上摆好带来的三本书。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和阿尔多·李奥帕德的《沙郡岁月》这两本是我出门必带的，读了十几年还是读不够，他们的文字是我心灵的守护神。枕边无书睡不踏实已经成了习惯。

后来，书桌上多了本红封皮的《安娜·

布兰迪亚娜诗选》。我在517王少勇的房间看到这本诗集时，惊讶地问：“你也喜欢安娜·布兰迪亚娜？”他比我更惊讶，“不是你昨晚喝多了推荐我看的吗？你还说这本诗集适合我读，不过，你这个人喝醉了还挺靠谱的，我确实很喜欢她的诗，第一首读的就是《母亲》，我泪流满面。”原来，文学的交流也会时常发生在喝多的时候，只是我们不记得了。少勇又买了三本，给了我一本，还有其他两个写诗的同学。一来时，我就想和517的同学换个房间，因为那个数字是我的生日，现在，他成了我的好兄弟。

在这里，我见识了授课老师的博学，恍惚间有了那些年置身于南京大学课堂的感觉。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数码转型时代的电影与文化》一课中衍生出来关于人类文明的生态灾难的短短几句就解开了我多年来生态文学写作中的一个死结，我除了满怀感恩再也沒有其他言语可以表达了。在这里，我第一次去国家大剧院看了令人震撼的话剧《商鞅》。在这里，我收到的第一样刊是今年第二期的《钟山》，有朱斌峰的小说《碉堡成群》，有贾浅浅的组诗《沉默的谜面》，还有我的散文专栏《我的词

条》。我特别珍爱这一本刊物，我们一边在教室里做同学，一边在纸刊上做“同学”，看着名字挨在一起就十分美好。

在这里，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记录片《垃圾围城》。在这里，我写的第一首诗叫《蜗牛》：“如果在蜗牛的家族/一颗露水/足已喝上几个下午茶/一畦韭菜/足已远眺森林/一只老奶奶的布鞋/云般越过天空/葡萄快熟了/黄鹂鸟别笑我/我们的夏天不一样/我有快乐，也有恐惧/长不大/永远是个孩子/天黑了，迷路了/探起触角喊着妈妈/30多年过去了/我用慢/留住了故乡”。有趣的是那天去茅盾故居，在南锣鼓巷我遇见了一块石头，上面雕了一只玲珑的蜗牛。我毫不犹豫地买了它，挂在脖子上，其实我买它的时候忘记了写下的这首诗。现在我想起那条巷子的那个小店还有一只蜗牛，我得在被人买去前把它找回来，送给喜欢的人。哪怕是错觉，我也会以为时光已在我们身上慢下来，会有一颗露珠裹住她的容颜。

4月很快就过去了。3月的时候，女同学们就爱在玉兰树下合影，拍着拍着，繁花落尽了。无关年龄，她们还在我眼里开着，

□张羊羊